新书评介

《蒙古源流》与《〈蒙古源流〉研究》

成崇德

在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中,《蒙古源流》可以说是流传最广、刊译最多、声誉最著的作品。清乾隆年间,这部书被译成满文和汉文,后又编入《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是其中惟一汉译民族文字的历史著作。《蒙古源流》有蒙、满、汉各种文字的抄本、刻本流传;在国内,还有沈曾植等的笺证或译注本;在国外,从1829年起,也出版了德、日、英、朝鲜文各种译本、注译本、拉丁还原本,以及各种抄本、刻本的影印本,已成为民族文字史籍中传世最广、闻名遐迩的代表作。

《蒙古源流》入藏宫廷,以蒙、满、汉文刊行,已距成书百余年,辗转传抄,讹舛衍脱越来越多,加上抄写整理者的主观增删篡改,已失原貌。因此,对《蒙古源流》的原文校勘、拉丁音写、翻译、注释是蒙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乌兰女士的《〈蒙古源流〉研究》是国内第一部对蒙文史籍进行全面科学整理研究的学术著作,代表了目前国内外《蒙古源流》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开创性的范本价值。

首先,《〈蒙古源流〉研究》为蒙文古籍乃至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对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示范作用。以往国内古籍的整理研究缺乏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成果形式局限于单一的原文校注或汉文译注,校勘用本和译文底本的选择也时常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且注文的学术水平有待提高。《〈蒙古源流〉研究》的作者根据自己研究工作中的体会,曾于1984年撰文提出了整理研究蒙文史籍的看法(《关于整理蒙文史籍的意见》,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3期),认为蒙文史籍的整理研究“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译文、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并指出应当这样做的理由。从蒙文史籍的特点和学术研究的要求出发,这几项内容确实必不可少,国外近几十年来的有关研究也基本采取类似做法。《〈蒙古源流〉研究》作者的意见得到了当时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翁独健教授的肯定,他希望有关的研究者能够重视和学习。今天的《〈蒙古源流〉研究》正是这一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在结构上包括“导论”、“译文和注释”、“原文拉丁音写”,以及附录“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蒙汉专名对照及索引”。

其次,《〈蒙古源流〉研究》将使《蒙古源流》的综合研究水平推进到更新更高的阶段。已故著名蒙古学家亦邻真教授曾视《蒙古源流》的研究工作为“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导论、汉译、注释、拉丁音写(包含版本校勘)几个部分各有特点,需要具备不同方面的知识,运用不同研究手段。《〈蒙古源流〉研究》在上述几个部分均不乏独到创见和精彩之处。

蒙文古籍的整理研究,首先要求对古籍应有全面透彻的了解和掌握,任何疏漏和偏差都

[收稿日期] 2001—04—20

[作者简介] 成崇德(1949—),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会直接影响研究的质量。《〈蒙古源流〉研究》书前是一篇长达 5 万字的导论，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蒙古源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论述多有进展和创见。尤以对原书作者、书名年代、史源文献、版本流传及研究的论述最具功力，显示了作者对原书研究的深度。论述版本流传各本，指出其长处和短处，细致入微，以有无喀尔喀人的增补和清廷的增删为依据，将流传诸本分为库伦本系统和殿版系统两大类，抓住了本质特征，令人信服。介绍、评论此前的各种译本，指出其贡献和不足，评价公允恰当，不乏精彩意见。

原文拉丁音写部分，作者首先在充分掌握原文流传过程和诸本特征的基础上，选择目前学界公认的最佳版本库伦本为底本，又选出阿刺黑苏勒德本、殿版、施密特本等各有长处、各具特色的版本为参校本，校勘中不仅注意了本校和版本校，同时还用《黄史》、《黄金史纲》等其他蒙文史书进行了他校。校正、勘误、补遗、删衍多达 460 处。经过精心校勘制出了定本，这样就保证了原文能够最大程度地完整、正确地反映原书的原貌。《〈蒙古源流〉研究》所提供的原文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外《蒙古源流》最好的本子，是可供研究、阅读或译成其他文字的一个标准本。作者书中所声明的“不用后来的正字法改动原文，即不用清以后的规范书写形式代替原文中的习惯写法，以保持古籍的原貌”的校勘原则，对整理蒙文古籍具有指导意义。拉丁音写是蒙文史籍整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很见功力的研究工作，它反映整理研究者的识读水平，给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提供正确阅读原文的有益参考。以往国内的蒙文古籍整理研究者都未曾对所研究的古籍进行过拉丁音写，致使其研究成果达不到完全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要求，所提供的原文仍然难以给学界和读者更好的帮助。《〈蒙古源流〉研究》遵循国际蒙古学界的惯例，对原文进行了拉丁音写，弥补了国内蒙古学界同类研究中的一项缺憾。作者采用了目前国际蒙古学界通用的音写形式，同时为便于复原，使用了一些特殊音字符号，做了一些特殊的技术处理，如用# 转写原文刚性词中的 g，用* 转写原文柔性词的 y，用= 连接原文中因移行而分写的单词等等。这些认真细致的作法，很有必要且切实可行。音写一丝不苟、准确精当，解决了前人的不少疑难，显示出作者深厚的语文学功底。

译文和注释也是蒙文史籍整理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译文有助于专业研究者的广泛利用和各族读者对蒙古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了解。鉴于影响较广的清代汉译本以及现代汉译本误译、缺译较多，《〈蒙古源流〉研究》所提供的新的汉译文更具有纠讹补缺的特殊意义。《〈蒙古源流〉研究》采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较旧文言体更是明了，更能忠实于原文。作者汉文、蒙古文水平均佳，古蒙古文造诣亦深且通晓满文，有一些藏文方面的知识，能阅读日文、英文，又具备较广博的有关历史知识。前人的译文中存在大量的误译，其中不少是因清代满译本的误译而致误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对外来语（如梵语、藏语、汉语等）或有关历史事实的不了解而致误的。《〈蒙古源流〉研究》的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译文准确而流畅，前人的误译缺译在新译本基本得到了更正补充。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教授称《〈蒙古源流〉研究》的译文“文笔流畅优美，从而使《蒙古源流》一书朗朗可读，实为一大贡献”。

注释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要求注释者有多方面广博的专业知识，不仅需要充分利用蒙、汉字史料以及其他文种文献资料，而且还需广泛参考吸收国内外前人研究成果。注释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整个整理研究工作的成功与否。《〈蒙古源流〉研究》的注释共有 629 条之多，字数约为原文的 3 倍，信息量很大，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作者参考了大量有关史料，全面考察了前人研究成果，详征博引，资料翔实，考订细密，有不少新意。许多条注释都可以成为一篇独立的小论文。注释从语文训诂、史实考订两方面展开，对蒙古语词进行语文学分析，揭示深层次的问题，原书所涉及的梵语、藏语，基本都作了可靠的解释；对原书某些与史实不符的记载，大多能通过考证纠正讹误并指出其致误的原因。整个注释部分的学术价值之高和资料含量之大

是令人叹服的。

书末附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和“蒙汉专名对照及索引”，以便利用者核对、检索。索引中所收人名、地名、部落名达1500多条，不仅给出原文拉丁音写和新的汉译名(多依当时汉籍中的译名)，而且后附广泛流传的清代译本的译名，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和读者的利用。

总之，《〈蒙古源流〉研究》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通过这部书的校勘、拉丁音写、翻译、注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在原文的校勘中，通过鉴定选择出最优秀的版本作为底本，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参校本的选择。特别是在现存抄本较多的情况下，应选择其中不同系统、各有特色若干原始抄本作为参校本。还要注意利用其他蒙文史籍。就是说，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校勘：一是用底本前后文进行本校；二是用其他版本进行对校；三是用其他蒙文史籍进行他校，以达到改正讹倒衍脱的目的。根据古籍整理的要求，对经过校勘了的原文还需添加现代标点符号并进行分段。为了保留古籍的原貌，在校勘当中应注意一条原则，即不能用后来的正字法改动原文，不能用规范书写形式代替原文的习惯写法。对经过校勘的原文进行拉丁音写，是蒙文史籍整理工作中一项必要手段，不容忽视。维吾尔体蒙古文由于它书写形式的特点，很容易被误读，拉丁音写能够帮助读者正确掌握原文的书面语读音。这种音写，是音形兼顾的。在进行拉丁音写时，应采用目前蒙古学界通用的书写形式。在汉译时，译文文体宜采用现代汉语，以求适合时代的要求。专有名词的音译，宜力求接近明人译写的习惯，以便读者同明代汉文史料进行参照。注释，是整个蒙文史籍整理工作中一项学术性很强的部分，注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文训诂，一是史实的考订。前者包括译音勘同、疑难词语的解读释义、词源探讨、正字法的比较等等，后者包括年代、世系、事件、人物活动、地理、部落沿革等方面的考证和研究。其学术意义，正如著名蒙古史专家周清澍教授在为《〈蒙古源流〉研究》所写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首先，《蒙古源流》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定本和译本；其次，它的出版对我国蒙文古籍以至其他民族古籍的研究将发挥示范性的作用，必将推进我国整理民族古籍的研究水平；第三，将民族文献的研究与国际惯例接轨，可以预期，它将在国际蒙古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从书中还能感受到作者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近些年学术界学风懒散、忽视质量的风气有所抬头的情况下，《〈蒙古源流〉研究》作者的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应当受到推崇。

任何优秀的作品也不免存在瑕疵，《〈蒙古源流〉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或许为了尽量忠实于原文，汉译文的个别地方显得有些过分拘于原文，不够通顺。或许为了追求严谨，注释中一些本可以作的推论和发挥因囿于材料而未能展开。